

康有为的“国学教育”及其对青少年培养的启示

何世剑

(南昌大学 艺术与 design 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为当下的青少年培养提供思想资源及实践范例,结合大量史料,对康有为的“国学教育”实践经历、思想和方法进行发掘、体认和剖析。分析认为,康有为重视教育,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学术,但不废新学;主张改革教育,倡导“博学”、“中西合璧”,兼采中学和西学之长以培养社会需要的新式人才,从而实现“教育强国”目标;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重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整体提高,其中德育尤重;教学方法上,采用“启悟式”教学法,引导学生提高自我学习能力、思辨能力;注重“对话式”教学,在自我之间、文本与学习者、师生间、学生间进行对话,共同分享学术思想智慧,提高文字写作、语言表达能力;倡导“从游式”教学,常常带领学生去体验自然山水风光、参与与他人的谈论对话——“耳濡目染”、“见贤思齐”。

关键词:康有为;国学教育;教育方法;青少年培养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1-0111-06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是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国学教育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康有为的一生,培养了梁启超、陈千秋、徐勤、麦孟华、韩文举、区榘甲、陈焕章、伍宪子等一大批国内声名显赫的学者、政治家,在国学教育与文化传承阐扬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下传统文化复兴及国学教育思潮之中,认识康有为的国学教育实践经历,把握其国学教育思想,发掘其国学教育方法,可以为当下的青少年培养提供思想资源及实践范例,这也是新世纪中华民族教育事业复兴、发展的重要方面。

一、康有为的“国学教育” 实践概述

康有为的国学教育经历很丰富,大致可以分为

3个时期:(1)在家乡教授几位弟弟,进行了初步的教育实践,积累了一些国学教育;(2)“万木草堂”时期,此一时间段历时最长,影响也最大,培养了一大批有志青年,为“维新变法”准备了人力资源;(3)在西安、大连、青岛等各地讲学及“天游学院”教学时期,继续阐扬他的教育强国理念、尊孔诵经思想,并且将他的一些新思想传授给学生。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记述,早在光绪六年(1880),他就开始教弟弟康广仁读书,当时其堂弟康有铭和康有需等随之学习,所教内容主要是经学和史学,另外他也引导他们读经学和史学之外的一些书籍。几个兄弟受他的影响,都接受了“维新变法”思想。康广仁后来随之入京从事变法运动,并创办过女校和发起过上海反缠运动,惜乎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头,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康有需成年后赴美国留学数年,在20世纪初回国参与

收稿日期:2012-08-25

基金项目:共青团中央规划研究课题(2008GH170);江西省教育厅教改课题(JXJG-11-1-23);南昌大学教改重点课题

作者简介:何世剑(1979-),男,江西萍乡人,副教授,文学博士。

了宪政党运动。早日执教辅导弟弟们学习,为康有为积累了一定的青少年培养教育经验。

“万木草堂”授学是康有为国学教育的主要阶段,时间约8年,培养了许多青年才俊,莅临此地求学者络绎不绝。1890年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为翁同龢所截留而不得上达天听,康有为归来后悟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1]之理,决定从培养与教育人才入手,壮大声势来响应和支持其变法主张。当时,学海堂学生陈千秋慕名来访,为康有为学问和思想所折服,转而拜康有为为师,并且将梁启超也引入康有为门下。梁启超后来回忆起他与康有为的相见写道:“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某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入见,乃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陈千秋、梁启超相继拜在康有为门下,鼓舞了其办学授业的信心。1891年春,康有为开堂于广州长兴里,陆续入学有约20人。第二年,学生人数增多,迁至卫边街邝氏祠堂,再过一年,三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正式取名为“万木草堂”,从学者增至50余人。此后,“从游”者愈多,动至数百千人,成为了一个规模甚大、影响甚广的教育机构。这一期间,康有为曾有2次“桂林之游”进行讲学,也值得注意。另外,康有为还振臂高呼,议开“强学会”、“圣学会”等,发展教育事业。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逃亡海外16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31国,行60万里,“万木草堂”不再招生收徒。在流亡日本等地时,康有为一方面进行全球文化考察,另一方面亦曾预学教徒,继续阐扬他的教育理念。

康有为1913年冬归国,结束了国外流亡生涯。周游各国,康有为得以考察各国文化,比较中西文化差异和优劣得失,发现西学并不像他早年认识的那样优秀,许多方面也存在很多弊端,经过比较亦进一步强化了其对中学的尊敬。归国之后,他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1914年,康有为抵达上海,演进大同学说,并且倡议创设了孔教会,主张在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反对废除以拜跪礼祭祀孔子,

并且到处发表演讲为尊孔读经鼓与呼。1916年6月,康有为赴杭州,宣讲孔教;8月,他在山东曲阜举行的祭孔大会上,被公推为孔教会会长;9月,到南京,亦发表尊孔学说。次年,康有为又与张勋一道,担任“各省公民尊孔联合会”名誉会长,为复辟做文化宣传。对于北京大学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康有为甚是反感、强烈抵制,但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亦发表过《请诛国贼救学生电》。1919年7月,他还电告犬养毅,敦促日本归还青岛。1923年4月,康有为至济南,5月赴青岛,于两地设孔教会;9月应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所邀请到西安讲学,他先拜谒了文庙,行祭祀孔子之礼,过了几天,在刘镇华亲自主持下做了演讲。但当时学界正醉心于新文化运动,流行打倒孔家店,康有为所做演进成效不佳;10月游咸阳周陵,并做演说。之后,发生了盗经事件^[2]。1925年仲秋,康有为到大连展览书法,应日本人岩间德也之邀,于8月3日到金州参加孔庙丁祭,赠“为善最乐”等给陪同相祭之人。1926年2月,创办天游学院于上海游存庐,在此执教半年。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时期讲学和晚年的“天游学院”时期讲学,大致体现了他从事国学教育、用国学思想培养青少年,实践其教育强国的信念。这两个时期,培养的优秀人才难以确数。民国十六年二月,康有为七十大寿,梁启超撰寿联说:“入此岁来,已七十矣;从其游者,盖三千焉。”高度概述了康有为培养学生之多,影响之大,如“万木草堂”时期,跟随他学习的甚众,“其中最得意的后有大成的门生有梁启超、陈千秋、徐勤、麦孟华、韩文举、区渠甲、陈焕章、伍宪子等。后来,他周游各地,讲学收徒,慕名执弟子之礼者亦多,如后来投入革命军的马君武,即是康有为了于光绪二十二年在游桂林时所收的弟子”^[2]。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中指出,康有为为学生中后来在学术领域颇有成就的甚多,如以佛学而论,可提梁伯隽作代表;讲到刑法这一方面,可以陈千秋作代表;至于道家一流,则曹箬伟可作代表;墨家的无我博爱,可以梁启超作代表。梁启超曾写了一部《墨经校释》、一部《墨子学案》;徐勤始终跟随康先生搞政治^[3]。“天游学院”时期所培养的学生,后来也大多成为社会精英,“(刘慕曾)长黔省绥阳遵化县令,察吏爱民,以廉干著闻。陈诚领东北行辕时,出为辽宁省府委员兼秘书长。大陆沦陷后莅台,任省府主任秘书……李微尘寝馈于康师字体甚深,所书康体,惟妙惟肖。先后主持新加坡《南洋商

报》笔政,及电视广播新闻部门,后任李光耀总理公署新闻秘书,曾荣获国家行政功绩金章,霸气横溢,为天游同门中之特殊人物”(蒋贵麟《追忆天游学院》)。在国学教育史上,康有为应该占有重要地位,只不过为他的政治影响所遮蔽罢了。其学生梁启勋曾说:“假令康先生终身讲学,不作政治活动,其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更大。用其所短,惜哉。”

虽然康有为由于晚年组织保皇会、支持和参与张勋复辟事业等声名颇受社会批判,但是历史地讲,他大力创办书院、学院,实行国学教育,培养青少年的行动和功绩是值得肯定的,后来也得到了毛泽东、吴玉章等的认可。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称:“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2]吴玉章于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时曾称:“凡是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的重大历史事件,不论事情的成败利钝,也不论参加这一事变的人后日的是非功罪,只要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进步作用,只要是对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我们就要纪念它。……戊戌变法虽然只是一百天,但它确实起了启蒙作用,开风气之先,它要打破陈规旧习,废除八股取士的制度,主张开办新式学校,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等等。一时除旧布新的政令不断发出,维新变法的学说风行海内。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广大的进步青年。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很受感动的。”^[2]毛泽东、吴玉章的评价实事求是,还原了康有为的历史功绩,也算是盖棺定论了。

二、康有为的“国学教育”思想

康有为的国学教育思想对于当下的新国学教育和青少年培养仍有不少启示和借鉴作用。从梁启超的《南海康先生传》、陆乃翔等的《南海先生传》、卢湘父的《万木草堂忆旧》、梁启勋的《“万木草堂”回

忆》、蒋贵麟的《追忆天游学院》、任启圣的《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等文中可以考察和体现其思想精髓,大致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康有为重视教育,他传承和阐扬中华传统学术,但不废新学,主张改革教育,培养社会需要的新式人才,教育强国。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但是其中对教育的意义是重大的。在康有为等的努力下,光绪帝于戊戌年六月二十三日下诏废除了八股,要求考生熟悉“时务”、策对经学和史学。八股的废除标志着旧式教育的终结、新式教育的萌生,之后中国教育开始渗透了新学思想和内容,培养的人才既学习旧式知识,同时也接受西方科学思想,西方实学教育与时俱增。除了考试制度的改革外,康有为还认为,有必要参照西方经验,建立学校制度,培养新式人才。他在《请广开学校以养人才折》中向光绪帝报告了西方教育的情况,他说佛雷特列克大帝创立了现代化学校,教授的课程包括历史等人文科学和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他还说,小学使儿童成为国民,高中训练青年各种职业,大学则为领袖与教师的养成所,形成彼邦的士大夫;决定普法之战胜利的不在军事,而在于教育制度优越。康有为和戊戌变法同仁特别奏请在京师设立大学,以发展现代学制。之后,光绪帝恩准建立京师大学堂。为了推广学校教育,康有为建议6岁以上儿童必须上学,可将旧式书院改为“中学”,之中需有西式课程,不能仅限制于语文学习,也有必要学习经世致用之术。为此,必须广开译书事业,由日译西籍翻成中文,以为新式学校提供教材和参考书。另外,物质之学欧美最发达,应该选派学生留洋,进一步扩大留学规模,亲身体验西式教育,学成后为国服务。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还重点谈到康有为“理想之社会”构建所做的设想,包括“进种改良”、“育婴及幼稚教育”、“教育平等”、“职业普及”等方面,不赘述。

第二,康有为的“国学教育”,主张“博学”、“中西合璧”,兼采中学和西学之长。康有为认为,健全的教育需要“中西合璧”。万木草堂时期及天游学院时,他均重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教学内容非常广泛。万木草堂教学之时,在他讲授的课程中有儒学、宋明理学、佛学、诸子之学,亦有西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等。天游学院时,他“所授学科,在义理之学为孔学、周秦诸子、宋明理学。考据之学为中国经学、史学、哲学、论理。经世之学则为政治原理、宪法、理

财、教育。文学之学则为散文、诗、词、书、画、日文、英文。从上列之学科,具见体备大用,与今之大学相较,实熔文学系史学系政治系哲学系于一炉”(蒋贵麟《追忆天游学院》)。康有为无论讲授中学还是西学,皆喜欢追溯“学术源流”,拓宽学生的视野;万木草堂时期,他的这种教育方式广受学生欢迎。梁启勋回忆道: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的“学术源流”。“学术源流”是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亦例举其源流派别。又如,文学中的书、画、诗、词等亦然。书法如晋之羲、献;羲、献以前如何成立,羲、献以后如何变化;诗格如唐之李、杜;李、杜以前如何发展,李、杜以后如何变化;皆源源本本,列举其纲要。每个月讲三四次不等,先期贴出通告,“今日讲学术源流”。先生对讲“学术源流”颇有兴趣,一讲就四五个钟头。他的这种讲学方式也遗传到了“天游学院”时,“所讲者多为学术源流,凡孔学、周秦诸子、宋明理学、西洋哲学、政治原理及中外史学,无所不讲。贯穿经传,融会佛道,旁探西书,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因之听者思想领域大为开拓”^[2]。

第三,康有为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皆为重视,其中德育尤重。他根据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建立起学纲,并且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释,内涵非常丰富。“志于道”:格物、克己、励节、慎独;“据于德”: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依于仁”:敦行孝弟、崇尚任恤、广宣教惠、同体饥溺;“游于艺”:礼、乐、书、数、图、枪。科外学科还包括:演说、札记、体操、游历。当然,这种重视德育的教育,还有着他对乃师朱次琦先生思想的接受。“康师尝从朱次琦(即九江先生)游,其学受九江之影响甚深。九江之授学也,以敦化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四者为学规,天游学院亦以此为训。其于敦化孝悌,以有子‘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一语相勉。崇尚名节,以砥砺廉隅,临大节而不夺相勉。变化气质,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气质不和,发用偏颇,害事不少相勉。检摄威仪,以容止尚温文,语言去朴鄙,出入趋翔,尤宜端重相勉。当此孔学衰微,道德沦丧之时,上下倡导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而康师已在五十余年前即秉承九江先生之学规,以发扬吾国正统文化,唤起个人之自觉自律为倡矣。对思想迷失之人类社

会,实足震聋发聩焉。”^[2]康有为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给学生以表率 and 榜样,是以学风很好。“康师仪表端庄,举动凝重,从无文人不修边幅之陋习。盛暑见客,亦必整肃衣履而出。讲学时御长衫入座,未尝见其交足叠股。上堂讲授,口若悬河,声如洪钟,历时甚久,而八字着脚,始终不懈,其精力充沛,记忆力之强,迥非寻常人所能及,宜其为中国近代不世出之人物。天游诸生受康师之熏陶,皆容止可观,进退有度,从无佻挻儇薄之状。有时师不在座,诸生亦聚而会讲,各出心得探讨研究,绝无放荡不羁之态,天游学风严整有如此者”(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梁启超回忆《长兴学记》时指出:“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体育可以增强体质、健全身躯、愉悦心灵,梁启勋谈到:“万木草堂里面还有一个礼乐器库是贮藏习礼时所用的仪器。如钟、鼓、磬、铎、干、戚、羽、旄以及投壶所用之竹箭等。习礼,每月一次,先生自制一套‘文成舞’。钟磬齐奏,干戚杂陈,礼容甚盛。习礼有尊孔的意义”(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美育。康有为也是非常重视的,他亲自教导学生练习和欣赏书法、绘画。

康有为著书立说,终身不倦,引导青少年学习,加强国学教育,为他们指出了“向上一路”,收到了较好的成效。徐君勉曾指出:“《伪经书》等书一出,学界思潮顿时兴起了一场大的革命,少年新进,从之者众。康有为在晚清时讲今文经学,倡经世致用之说,树起了思想教育界解放之先声,二十年来维新改革之功,终当推为魁首。”

三、康有为的“国学教育”方法

通过阅读梁启超等回忆康有为的文章,我们还可以把握到,康有为的国学教育是一种“有定法中无定法,无定法中有定法”的形态。“无定法”体现在他接受自孔子以来的“因材施教”的理念,不以一套成熟的、固定的、呆板的方法去严格对待每一位学生,总是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不足,引导他们扬长补短。“有定法”体现在就整体而言,康有为的国学教育有自我设计,他重视学术积累和辨章学术,先是经过自己消化学术知识,思考和解析其中疑难问题,然后才面对学生讲授,从不敷衍塞责,只不过他所阐扬的“启悟式”、“对话式”、“从游式”教学因自由随性而显得无章可循罢了。康有为的国学教

育方法对于当下的新国学教育和青少年培养仍有不少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第一,康有为注重“启悟式”教学,引导学生提高自我读书学习能力、思辨能力。初见之时,康有为根据他对学生学识、禀性的判断,喜欢如禅宗一样的当头棒喝,给你“顿悟”。梁启超曾指出:“先生初接见一学者,必以严重迅厉之语,大棒大喝,打破其顽固卑劣之根性。以故学者或不能受,一见便引退;其能受者,则终身奉之,不变塞焉。先生之多得力弟子,盖在于是。”在“万木草堂”,“每天除了听讲、写笔记、读书之外,同学们每人给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功课簿是万木草堂一件重要制度。每见学生写一条简短的疑问,而康先生则报以长篇的批答。即以我本人而论,有一次我写一条质疑……我这条质疑,不过百十个字,但康先生当年的批答,却有好几百字。”任启圣回忆其在“天游学院”学习经历时亦说:“其主要功课则在笔记,每月论文十道,随同笔记一并送呈,由康氏亲自批阅,加以圈点,按时交还。其意重在自修,不在课堂,所谓讲解者不过启发之作用耳。”^[4]“其授业方法,为启发学者思想,使有所领悟,就所讲之学科,指导研究之方法,开示应参考阅览之典籍,并嘱为提要札记,拟题习作,朔望呈阅批改。凡学者每人设札记一册,分专精涉猎二门,每日必就指定所读之书,发新义数则,以明心得,如有疑问,则由康师解答。以故诸生必阅读典籍数十页,焚膏继晷,常恐不及。每半月作论文一篇,力求条理贯通,文笔锐达,不必求工。又时分班召见,考问所学,循循善诱,至诚恳息,殆孔子所谓诲人不倦者也。以视今日学校中教师之俯视教本,喃喃自语,教室如一哄之市,载号载呶者,不可同日而语矣。”^[4]对于学生的请教,康有为都会点拨他们、引导他们,并且对他们所学程度进行考察。““(梁伯隽)有一天,他请教康先生,现在要读什么书。先生说:“经书你已经读过,读史罢。司马温公的《通鉴》,繁简得宜,其中所加之案语,条条都好。凡是‘臣光曰’之下,就是他的案语,长则千数百字,短则三两句,无一不扼要而精警,就读《通鉴》罢。过了二十多天,他把二百九十四卷《通鉴》读完,又去问先生再读什么书。先生心里觉得有点稀奇,试举其中的人物或事迹问他,都能答复”^[4]。

第二,康有为注重“对话式”教学,在自我之间、文本与学习者、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进行对话,共同

分享学术思想智慧,提高文字写作、语言表达能力。康有为让学生在阅读书后,将“自得”写下来与同学一起共同分享。万木草堂设有“一本厚簿,名曰‘蓄德录’。每日顺着宿舍房间,依次传递,周而复始。各人每日录入几句古人格言、名句或俊语,随各人意志之所好,写什么都可以。譬如写‘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等等均可。这些格言、名句除写在‘蓄德录’外,同时用一张小纸写出,贴在大堂板壁上。它的作用,是用以提起各人的警惕,引起各人的兴趣。每隔三五个月,先生也拿去翻阅一次,借以验其个人思想之所趋向,不无补助”(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这样,老师、师生、同学间皆可以受惠,对话教学也常见,康有为常让学生就学术问题和时政事物进行论辩,成效颇佳。梁启勋多年以后对这种教学方式还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回忆道:“当时满清科举制度除考‘八股’外,还有一场考‘经古’是关于学问方面论述。这场关防不严,可以随便互相谈话,在考场中只有万木草堂弟子谈话,其他人都在听草堂弟子讲话,这也是社会影响的一种”(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

第三,康有为注重“从游式”教学,常常带领学生去体验自然山水风光、参与其与他人的谈论对话,这可以缓解学习的紧张、愉悦学生;可以扩大学生视野,增加社会阅历;还可以让学生跟着老师“耳濡目染”,感受老师的人格魅力,“见贤思齐”。康有为的这种“从游而教”,深受孔子及其弟子影响甚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言:“子路喜从游。”《论语》中也曾谈到孔子常和学生出游而谈,历史上追随孔子周游列国的学生不在少数。“从夫子游”后来成为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康有为也吸取过来了,像徐勤等学生始终从康有为游,参与政事之时亦提高自身学业。康有为有意让学生参与他的一些日常活动,让他们在生活点滴中自我开悟。梁启勋曾谈到:“总督、巡抚、学台到任,先拜山长,山长回拜。康先生每次会见他们,大概都带一两个学生同去。因为他们见面,总是谈学问,常时辩论得脸红耳热。跟去那一两学生,隅坐旁听,获益不少。”“从游”教学还体现康有为仿效孔子,指定学生中优秀者帮带其他学生学习。梁启超即为“万木草堂”时的“学长”,领导新生读书,跟随老师进行“学术实践”也是康有为“从游式”教学的重要体现。梁启勋回忆中谈到:“在万木草堂我们除自己用功读书之外,还有一种特殊工作即编书,这是协助先生著述的工作。

譬如康先生要写一部《孔子改制考》，由他指定一二十个同学，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各学者的著述，从头检阅。凡有关于孔子改制的言论，简单录出。注目见于某书之第几卷、第几篇，用省属稿时翻检之劳。时间由编书团体共同商定，每月上旬某日某日，中旬某日某日，下旬某日某日，自几点至几点，会合在大堂工作。仍坐无靠背之硬板凳。某人担任某书，自由选择。一部编完，又编第二部。这些稿件，统存于书藏，备先生随时调用。”这种根据激发学生兴趣，随同阅读和整理学术典籍的行动，为学生巩固学识提高了机会。

总体来讲，康有为博学多识，对于学生学什么、读什么书甚为讲究，对于如何教授学生、引导学生及教材选用和建设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如天游学院时，“康师以入学诸生，颇多不知读书方法。曾于讲学之前，先述研读经史子集之法，并列举书目。略谓读书当从专精涉猎二事着手。惟专乃可致精，惟涉猎乃能致博，二者不可偏废。经学当读……”（蒋贵麟《追忆天游学院》）。万木草堂时，有一回康有为见卢湘父编《妇孺韵语》，以各字分类，编成四字之韵语。先生见而善之，曰：‘蒙学亟须改良。汝能为此，亦大好事。今为蒙学假定书目，为之发凡起例，汝试为之。事若有成，亦无量之功德也。’乃援笔写成一纸以授我……”（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但凭记忆，瞬间为卢湘父开列了一张书单，指导卢湘父完成这项编纂工作，惠于妇孺。相传康有为早年读书，以读一锥子书为限，非常勤奋。每天早上起来，他都拿出一把锥子，用力凿向一堆书，凿多深，则当天必须读完，哪怕是读至深夜也不废学，绝不遗留至第二天。这一规定一直坚持下来，使得他成为了博学鸿儒。正是由于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学术底蕴，所以他才能在指导学生时得心应手。我们常说，要想教授学生一杯水，老师必须先有一桶水。这一点，在康有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也启示我们今天的教师，教学不仅仅是用几本教材和参考书就能完成的事情，必须首先加强自身的学习，积累丰富的知识，融会贯通后才能有底气面对学生。康有为“有定法而无定法”的“言传身教”，值得我们每一位老师细加把握和发扬。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康有为在倡导维新事业并推动中国

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心和重视教育，他希望能够传承和阐扬中华传统优秀学术，激活其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培养国家政治、文化建设的必备人才。但康有为也没有看不起“新学”，特别是他游学的经历，开拓了他的视野，认识到西方新学在科技强国方面的重要意义。作为一个没有彻底的革新精神的旧氏文人士大夫，康有为虽然发动了改革教育的运动，并且通过自己创办私塾、学校，倡导“博学”、“中西合璧”，从而兼采中学和西学之长来培养社会需要的新式人才，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但是他的改革是保守的，仍然还是张之洞等清流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和实践。康有为非常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重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整体提高，其中德育尤重，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思想活力、引领时代发展潮流的学生，其中梁启超乃佼佼者。但尊师重道的传统和“天地君亲师”的纲常观也制约了康有为的学生们超越他，有更大的更彻底的革新举措。教学方法上，康有为擅长采用“启悟式”教学法，引导学生提高自我读书学习能力、思辨能力，他只给学生以书单、思路，鼓励学生自己求索和解析问题，并不直接将自己的观念强加其上。康有为推行“对话式”教学，在自我之间、文本与学习者、师生间、学生间进行对话，共同分享学术思想智慧，提高文字写作、语言表达能力。康有为还倡导“从游式”教学，特别是到了晚年，倡导以自然为师、以社会为师，常带领学生体验自然山水风光，考察社会问题，参与时事政治的谈论对话，让学生在交游中“耳濡目染”、“见贤思齐”。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康南海先生传[C]//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第6卷. 北京:中华书局,1936:62.
- [2] 夏晓虹. 追忆康有为[M]. 北京:三联书店,2009.
- [3] 梁启勋. “万木草堂”回忆[C]//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62.
- [4] 任启圣. 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C]//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237.

(下转第124页)

“SU Shi’s theory spreading abroad the nor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in Ci in Jin Dynasty

HU Mei-x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SU Shi’s theory spreading abroad the nor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in Ci in the Jin Dynasty were expounded in this paper mainl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multiple national cultures in special time and region during Dading and Mingchang period in the Jin Dynasty. The influence of SU Shi’s theory on the Jin Ci in the Jin Dynasty in terms of “entrusting drift with things” and his writing practice. The spirit of detachment from SU Shi’s theory was inherited. SU Shi’s theory was succeeded selectively in CAI Song-nian’ Jin Ci (early Jin Dynasty) and ZHAO Bing-wen’s Jin Ci (in the middle Jin Dynasty) and YUAN Hao-wen’ Jin Ci (in the later Jin Dynasty).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in the Jin Dynasty was the course of transmission of SU Shi’s theory. The theory was being developed and selected. It is better to consider Jin literature inheriting from SU Shi’s multiple thoughts than from the tradition of SU Shi’s poems.

Key words: “SU Shi’s theory spreading abroad the north”; spreading; inheriting; Jin Ci

(上接第 116 页)

KANG You-wei’s “Sinology educ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youngsters’ development

HE Shi-jian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Jiang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practical examples for the current youth cultivation, the practice experience, thoughts and methods of KANG You-wei’s “sinology education” were analyzed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KANG You-wei emphasized education,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earning, but not abolished the new learning. He advocated education reform, proposed “extensive learning” and “a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lements”, and developed new personnel by utilizing the strength of Chinese and Western knowledge, so a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education power. He attached much importance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qual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oral education, intellectu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especially to the moral education. In the aspect of teaching methods, he adopted the “enlightenment method” to lead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self-learning and self-thinking ability. He also emphasized the “dialogic method”, which included the types of dialogues between selves, textbook-learner, teacher-student and student-student so that learners can share the academic wisdom of thought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of writing and expression. He advocated the “viewing method”, which often demanded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natural scenery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so as to be influenced and see a wise.

Key words: KANG You-wei; sinology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 youth cultivation